



蓝之又蓝

——序《比景泰蓝更蓝》

□林清玄

喊了许久。

无人回应。

我们只好沿着原来的小路走向纪念馆，听到远远地传来“吧啦不鲁”的喇叭声，原来是卖土制冰淇淋的小贩，到纪念馆卖冰淇淋。“三个球10块。”他说。

我买了几个冰淇淋给孩子吃，我自己也吃了一个。这种“吧啦不鲁”冰淇淋又软又绵，是我儿时最向往的东西，唯一不同的是三轮车换成摩托车了。”他说。

“外地来的吗？”小贩边挖冰淇淋边问，用客家腔的话。

我们尚未搭腔，他又说：“可怜哦！这是我们一个美浓的作家哩，听说是饿死病死的，写字赚钱实在是太艰苦了。”

“嘿，我还听说，”那小贩语气较为神秘地说，“这个作家临死之前传下家训，子子孙孙不得以写作为业呢！”

小贩把冰淇淋卖好了，看看纪念馆里没有其他顾客，他跨上摩托车，回头对我们说：“我先失礼！我卖冰，有卖就有赚，写字的，写了不一定有赚，这个你懂吗？”

哈！摩托车开走了。

“我懂！我懂！我懂！”我点头如捣蒜，孩子们都笑起来。那小贩做梦也想不到是在对一个写字的人教课。我心里想，像钟理和先生一样的悲哀，但愿此后不会再发生。

看到卖冰淇淋小贩的身影消失在槟榔林里，我觉得写作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也是在暑热焦渴的生命中贩卖心灵的冰淇淋，只不过还没有沿街叫卖罢了。

回到台北以后，接到邱鸿翔兄的电话，谈到“台湾笔会”和“钟理和文教基金会”正在办“杨达、钟理和回顾展”，希望能再一次向杨达、钟理和等前辈作家致敬，唤起大家对文学的重视，并盼望很快在杨达奉献半生劳力的东海花园建一座“杨达纪念馆”。

这个构想很令人安慰，说明了写字的人虽然寂寞，也有很不寂寞的地方。

鸿翔兄把计划寄给我看，我对其中的几句话玩味再三，心中感慨。这几句话是：“盖一座文学的纪念馆，定一个文学纪念日，为一条街道取一个文学性的名字……这样的花费并不多，但是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浸淫于人文国度里，活得有气质、有美感。”

是呀，别让卖冰的看扁了！

2 每一个作家都有不为人知的寂寞的一面，或者在热闹的街头踽踽独行，或者在静谧的山林思潮翻腾；或者坐在小小的书桌前，写下一道道生活的刻痕；都是要独力完成，

品尝生命的苦汁和乐水。

写作既是一个寂寞的事业，为什么还要写呢？

我想，写作是来自于一种不得不，是内在的触动和燃烧，好像一朵花要开放，那是不得不；一只鸟要唱歌，也是不得不；一条河流要流出山谷，也是不得不！

我总是相信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处“清泉之乡”，有的人终其一生不能开发，因而无法畅饮甘泉，写作的人则是溯河而上，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清泉，并且翻山越岭，把那泉水担到市街与人共尝。

在寻找泉水，并挑担到市街上的过程，是非常寂寞的，可是在市井中如果遇到知音的人，也

有不寂寞的时刻，就像两朵云在天空相遇，而变成一朵云了。

陌生的人为什么能相知相惜呢？为什么透过文字能超越时空、超越阻隔呢？

那是因为在最终极之处，有一种蓝比景泰蓝更蓝，有一种香比夜来香更香，使我们深信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思想都将在人间留下影响：也使我们无所怨憎、无所退悔，去实践并完成我们对生命的认识。

文学家岂是为了纪念馆、纪念日，或是一条街道写作呢？把公园、街道、学校、纪念馆取自己的名字，是那些缺乏自信的政客的标志，哪里是文学家的追求呢？

文学家是为世间的有情心灵而写作，是为自己的生命之泉而写作，是为了触及更蓝的境界而写作。

这是为什么把这本书的书名定为《比景泰蓝更蓝》的缘故。

3 此书是继《越过沧桑》之后，“无尽意系列”的第二本，有许多篇章谈到文化、教育、社会和政治。

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家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不能独存于世间，对于现实事务的关怀，正是使社会走向更圆满之境的手段。何况，当我们说关怀众生、解救众生的时候，如果众生处在不公平、不正义的社会中，将不能得到解救；如果众生生活在没有文化、没有品质的社会，将无法得到提升与安顿。

这些年来，我写了许多现实而入世的文章，是来自一个深切的认知：人心需要觉醒、社会需要改革，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好像20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讲出“众生平等”的教法，不只是在阐明佛性的平等，也是在打破封闭的阶级制度，重建社会的公平。

当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时而感到寂寞，如同开在深山溪谷中的百合，独自维持灵醒的白，但也有不寂寞的时候，有如群树站立在晴空丽日之下，体会到流过的微风，看见了远天的彩虹。

不论寂寞或不寂寞，让我们维持着比景泰蓝更蓝的心吧！不要失去关怀的能力，不要让爱的泉源枯竭，不要断绝了更清明的希望。

让我们湛而又湛、蓝之又蓝，即使生活在浊恶的世间，也永不失去自清与无染的立德。

形与影之间

□林清玄

《比景泰蓝更蓝》文摘

系舟。

可见一个文学家从事创作乃是基于心灵的渴望与表达，有市场时固然可以刺激作品产生，即使没有市场，也应该一样能写出好的作品。当一个文学作家必须仰赖市场而创作，表示他的创作心灵尚未到达成熟之境。

因此，读者不应该为文学的没落承担责任，何况现代人不读书也不公平，以近几年为例，台北就出现许多家卖场超过400坪的大型书店，可见读书人口是在增加、不是在减少，当许多读书人宁可去读对心灵没有助益的东西，不愿读文学书，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文学家深思了。

市场既然无绝对关系、读书人的人口又在增加，文学却奄奄一息，我对朋友说：“我们写作的人应该反省。我每读报上好书周刊介绍的好书，都觉得比读唐宋时期的诗作还难懂，文字艰涩、思想僵化、创作力浮夸、写作态度浅薄，名利心跃然于纸上，文学没落实在是有道理呀！”

反过来说，要使文学重活于世间，我们必须写一些文字优美、思想开阔、创作力深刻、写作态度诚恳、不为名利写作的作品，这乃是拯救文学之道。

从大屯山主峰下来，夕阳已经快西下，满山的绿草蒙着金光，洁白的芒草含苞饱满，等待着秋天吐蕊盛放。它永远那样盛放呀！不会因为有人看开得更美，没人看就随便开一开。它不会先有意识形态再开，它不会结党营私，它也不会故意要开成后现代主义的样子。甚至呀甚至！它不会故意开出别人不能欣赏的样子，以证明自己的纯白。

由于夕阳的关系，大屯山的山影整个投射在马路上，我看到那影子的线条十分优美，简直可以想象那座山的伟岸，但是影子到底不是真实的山，所有对文学没落的思维、研究、检讨，都不如努力地去创作。所有的形式、主义、意识形态、同人情结都只是路上的影子，不是真正的大山。

我们的车子沿路下山，穿过台北县和台北市的界碑。我想到，文学家应该突破疆界，以更大的包容与自由来努力写作啊！

要使自己成为大山，不只是路上的影子。

（摘自《比景泰蓝更蓝》林清玄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）



1 夏天的时候，我返乡居住。由于我的故乡离作家钟理和的纪念馆不远，于是约好兄嫂带孩子一起去瞻仰钟理和纪念馆。

车子开到半路，正穿过美浓乡间秀美的田园时，突然雷声大作，一阵气势汹汹的西北雨漫天泼了下来。然后我们路过双溪，转入笠山，到了纪念馆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虽然大门开着。

我们在馆内看了钟理和的旧作，他遗下的手稿、照片，以及铜像和陶像。我站在纪念馆二楼的阳台上，看着连绵的雨势，想象着这非常热带的林木之中，是如何诞生一个令人钦仰的作家的呢？

当我们回到一楼的入口，我看到纪念馆在出售钟理和的遗作、美浓的风景明信片，收入将作为纪念馆的基金。我对大哥说：“我想买一些书和明信片送给朋友。”可是纪念馆中空无一人，我绕馆一圈，呼喝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

无人回应。

我看到大门旁边贴了一张纸条，“本馆因人手不足，只有星期六和例行假日开放，平日若要参观，请顺着馆前左侧的小路向前走一百公尺，找钟铁民。”

我指给哥哥看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去找钟铁民。”

“这样不好意思吧？”我担心突然的造访会惊扰到铁民先生。

哥哥表示，他和钟铁民都在美浓的中学教书，算是旧识，钟铁民又是我大姊的孩子的国文老师，因此突然来访应该不会惊扰他。哥哥还消遣我：“你已经染上台北人的坏习惯了，看朋友还要先约好时间吗？”

我们沿小路前行一百公尺，一路上林木苍盛，种了许多瓜果和蔬菜，一直走到一座门口有一棵龙眼树的三合院，龙眼结实累累，我们在门口高喊：

“有人在吗？”

“铁民兄在吗？”

写散文的理由

——《忧伤的野马》后记 □张瑞田

忧伤的野马



不久前，与几位文友小酌，其中一位“80后”的编辑问我：“你写过一本‘远东喋血’的书吧？”我看着这位略胖、戴一副眼镜，总说自己的耳朵听不清别人的话，一脸憨厚的笑容，不乏丝微傲慢、很有名士派头的人，点点头说：“这本书是2000年写的，18年了，我都忘记了。”他笑笑，然后埋首摆弄手机，一会儿，我在参与饭局的临时微信群里看到他的留言：“居然见到看过的书的作家本身，缘分太快来得。”“80后”的语言，望尘莫及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脑海浮现了我的拙作《远东喋血—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》，这是21世纪初，我为一部电视纪录片而写，时光荏苒，我的兴趣转移，这本书锁入记忆，不堪提及。

在这个不经意的晚上，我想人非非。青春岁月，激情澎湃，办报纸，拍电视，探险，写作，总觉得改革开放的时代，存在多种可能性，只要奋斗，就有结果。社会结构快速调整，价值观时常移位的青年时代，超越、挑战是关键词，一度乐此不疲。

这样开始一篇后记的写作，是想告诉读者，《远东喋血—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》的时代过去了，八面出锋，欲望膨胀的时代也过去了，时间、情感、印迹、思考、疼痛、怀念、理想，固化成文，还在身旁。那本笔触历史的书应该成为纸浆，但，那个时期的经历难以湮灭，本书中的《他乡与故国》《断指的手掌》，依然可感青年时代的“远东喋血”。其实，每一个人任何一次的告别，都很難。

一个人的最爱，是不是会随时调整？不知道。对于我来讲，读散文、写散文的最爱，不曾改变。这一种多思多虑，又洒脱、风雅的文体，与生命情思、个人趣味天然和谐，它几乎就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，在单纯的日光下或神秘的夜幕里，美丑、善恶、成败、冷暖、进退、古今、苦乐、爱恨，一一浮现。

这是读散文、写散文的理由。

《远东喋血—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》之后，我两度赴亚马逊热带雨林探险，记录了亚马逊河两岸的老故事和刚刚发生的新故事，就有了不断再版的散文集《探险亚马逊》。年过半百，痴迷故纸旧墨，有了随笔集《百札馆闲记》《百札馆三记》。由着精神的需求去想，由着个人的经历去写，因此，我与散文有了难得解难分的生命约定。

《忧伤的野马》收录的散文，少作与近作，短歌与长哭，讽今与刺世，观察与冥想，均是成长的见证，思想的历史，它是“宏大叙述”的另一面，是一个人的个人注释和艰难反省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可以坦然面对散文了。

（摘自《忧伤的野马》张瑞田著，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）

出发

人生一场，定有胜境，胜境之一，便是遨游天下，它是人生极致状态之一，几乎等同于任何人间富贵——为了“富贵”，我要“遨游天下”了，我要开车把整个中国都走上一遍。人都是自己的王，王者谓何？谓自己听命于自己并操纵自己，哪怕人声鼎沸，四方冒烟，大风吹得山都晃动，自己行动的方向也仍然是自己选择的方向。

我知道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一个现实中的人，要远行就必须创造出充沛的条件，而一个人如果真能创造出充沛的条件，就必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，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人是不可能放下肩上的重担去远行的。这就是天赋的规则：要上第二个台阶必须先上第一个台阶，而上到第一个台阶就必然不能再上第二个台阶，人生永远不可能到达第二个台阶。

为此，浩叹和遗憾成了永恒的命题，就像一个西方人的：人的一生，精力、时间、金钱，这三个东西是很难相遇的，少年时有精力有时间，没有钱；青年时有钱有精力，没有时间；老年时，钱和时间都有了，精力却没有了。然而凡事总有例外。人生到了某个阶段，精神中某个昏睡的部分就必然开始苏醒，现在，我身上某个昏睡的部分就开始苏醒了，我给自己题了几句话：人生在世，不搞不行，乱搞不行，看准了再搞，一搞到底。现在我就是看准了，我要把自己从现实的机器上拆卸出来，托地一跃，走！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自由了！大而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，它名山大川中的“名山”有多高？“大川”有多大？现在我要俯视它的全部光华，把它辽阔的境界变成我内心的一隅；我要用鸿雁、雄鹰和骏马的思想，为循规蹈矩的过去开拓出新的领域。

我的亲人摸摸我的头，问我是不是发烧了。我的朋友嗅嗅我的酒气，问我是不是喝多了。我的公司同仁坐在我的周围，问我果然要离开蒸蒸日上的公司吗。我一个同学的太太专门到我家来，愤怒地说你这样也太不负责了（我知道她是说湖险恶，我可能会随时死掉）！我的导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至少得再带上一个人，不然，病了怎么办？车坏在路上怎么办？遇到歹人怎么办？最后，我在机关和媒体工作的朋友带来了方案：让报社的记者跟着采访，电视台的记者跟在后面拍，而我的车和钱都由汽车厂家赞助。

我面含微笑，胸有成竹，不动声色。我与所有人间都有一面安宁的大墙，他们在大墙的那一边，我在大墙的这一边。我知道，人只有放弃过去，才有可能打开另一个未来；人只有在欲望的两侧一左一右，才能向高山前进。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时代。我想一切就这样吧，一切就这么定了：车是我自己的，时间是我自己的，钱是我自己的，清澈和纯粹是我自己的，没有红

文摘

人生六悟
□刘以林著



大气吹过来，旷野之上，即便是木瓜也会像猴子般一跃而起。

这一天我沿着山东的海岸线向南行，忽然下起了大雨，听雨敲打车顶，就像听宇宙在为我唱歌一样。大地馈赠丰盛，爽哉此雨！天下何时无雨？无此20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之雨耳！正此时，北京电话来了，有急事，要我立刻回去一趟。出行以来，这已是第三次了，前两次我都是把车放好，乘飞机回去处理了事又飞回来的。这一次我还要再回去？我停在雨里，听大雨哗哗地往下落。我听这雨，似乎别有深意，俗话说事不过三，我不如雨吧？雨直接，坚决，它离开天空后就是一个坚定的放弃者。我也离开了原来的天空，可是一个电话又能把我召回去了，天空能一个电话就把大雨召回吗？与雨比，我像是雾了，雾看起来比雨低，也似乎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可是风一吹就散了，它到不了泥土和水里，更到不了水的终极之地大海。雨是一个英雄，雾也想是一个英雄，但它永远不是。古人说“取法乎上所得者中”，取法乎下所得者何？大地的真理明朗苛刻，我欲坚决而又不能坚决，我要警惕了！

我打开车门，站到了大雨里。这是春天，大有夏天的冲击力，也有冬天的寒冷劲儿。我不一会儿就成了落汤鸡，人也有点哆嗦了。不过一个人要在战场上击败对手，是不怕小刀刃划破点皮的。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儿：20年前恢复高考时，由于事出突然，准备复习资料时来不及抄写，只能把初中和高中的书一页页往下撕，那些书一直被我如文物一般保存着，看着“文物”被毁，完全是一种暴殄天物的惶恐感觉，我每撕一本就想把它悼念一次。可是现在，那些“文物”到哪里去了？难道说，以现在要办的事比之于那时的“文物”，它会更重哪怕是一点点吗？20年后我站在另一场大雨里想现在的事情，一定会等于我现在想20年以前的事情，一定会的。

大雨下落，我在雨中站立着。忽然，我觉得哪儿“咔嗒”一声，一扇门打开了，一阵大雨落到门里，接着它又关上了。我回到车内，打了好几个喷嚏，脱光衣服，换了一身干净暖和的衣服。我觉得，现在没什么事情了，顶多打一个电话而已。我思虑空荡，心境清澈，灵魂之草全都起立，不为啥，只为迎天上的雨。

雨越发大了，我坐在车上不用动就几乎能读到河流和海浪。呜呼善哉！我问此雨：人遇鳞则鱼，遇羽则鹏，是不是就算得了点人生的“道”了？

大雨下了两个多小时，雨小下来后，我才开始向安徽方向前进。大雨过后，举目一望，巨大的白云逃散于天空，怒放的桃花中吐着火焰，在天地和人心之间，一切都是新的。

（摘自《人生六悟》刘以林著，作家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）